

【忆海拾珠】

范用忆书友田家英



田家英

爱书人习相近癖相投，遂为书友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在人民出版社工作，认识了田家英。他在编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官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，我们称之为“毛办”。

初见田家英，只觉得书生模样，看不出是延安的老干部，毫无官气。还不到三十岁，像个大学毕业生。我说的是四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，某些思想进步的大学毕业生，富有热情，但无浮躁骄矜之气，温文儒雅，谦恭可亲。当然这只是表面印象。有所接触，才逐渐了解家英的才干和为人，虽然他只读过几年中学，但是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，却成长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干部，“三八”式干部。

我们除工作来往，更多的接触是因为彼此都爱书，或者说都有爱看杂书的癖好。

他的杂有个范围，不外乎清末民国以来的文史著译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史料。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，在延安已经出版了两本有关民国史事的书。是延安有数的“秀才”、“笔杆子”。

他在中南海有间大办公室，除了一角放办公桌和沙发，几乎大部分地方摆满了书架。我每回去，谈完

公事，他都要领我参观藏书，尤其是新搜求到的书。他有跑旧书店的习惯，常去琉璃厂。出差到上海，必去四马路上海书店，收获甚丰，我看看也过瘾。

家英读书没有框框，不先分什么香花毒草，不以人废言，这大概跟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关，受老人家的影响。有人说毛主席当然读书无禁区，凡人又当别论。我不相信此种高论。我向来认为天下只有读不尽的书，而没有不可读之书。好书坏书读了才知道，信不信是另一码事，不可混淆。同一本书，见仁见智随你的便，书品跟人品没有必然联系。但也有嗜臭者，比如有人只对“此处删去××字”有兴趣，有人却看了作呕。不必担心，自有公论。一本书读了，再听听看看议论更好，七嘴八舌，早晚会水落石出，更上层楼。这也是东翻西看的好处之一。这比封闭起来，只有一家之言好，提倡百家争鸣是自信心的显示。

《海瑞罢官》有人认为“要害是罢官”，是为彭德怀翻案。家英读了却说看不出有什么大阴谋。孰是孰非，只有自己读它一遍，才能知道谁胡说八道。家英在这方面一点不含糊，不鸚鵡学舌，人云亦云。

我爱读杂文、散文、笔记，注意到家英收藏周作人、聂绀弩的集子相当齐全，跟我的相差无几。他说绀弩杂文写得好。

那时周作人的书旧书店有，但内部发行。家英对我说：“你缺少什么，我替你找。”内部售书要凭级别，分几个档次，家英常替毛主席找书，不受限制。我忝为中央一级出版社副总编辑，也还是低档次，有些书连看看的资格都没有。

有时他来出版社，也到我的办公室看书。有一部陈凡编的《艺林丛录》，是《大公报·艺林》副刊文章汇编，他很感兴趣，借去看了一两

年，几经催索才还来。他在我的藏书印之上加盖了“家英曾阅”、“家英曾读”印记，这在我，还是头一回碰到。

这部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，每看到它，心里十分懊悔，家英爱看这部书，为什么不送给他，我大小气。

我们常常议论看过的书、知道的，读书又谈人，谈文林轶事，古今网文、笔墨官司等等，直言无忌，毫无顾虑。他比我大一岁，生于一九二二，我一九二二。入党也只早我一年，他一九三三，我一九三三。我们是同时代人，有共同语言。他知识面广，有见解，我远不及他。有时看法不尽一致，并没有因为他官大，得听他的。

在家英面前，精神上平等的。与他相处，有安全感，不用担心有朝一日他会揭发我思想落后。有的人就得防着点，我就碰到这么一位，借我的胡风著作，说要看看，到清算胡风，却说我看那么多胡风著作，不可能不受影响。我说，读书看报，映入大脑就是影响，难道也有罪过，也得洗脑？

家英不仅买旧书，还醉心搜集清代学者的手札、日记、稿本，兴致勃勃地拿出来给我看，并且详作介绍。近人如黄侃、苏曼殊、柳亚子、鲁迅、郁达夫的墨迹，也有收藏。他买到过一本账簿，上面贴满函牍，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有来头，他一一考证，如数家珍讲给我听。他说解放初期在旧书店乃至冷摊，不难觅得此类故纸，花不了多少钱就可到手。他买回来装裱成册，汇编成书，其乐无穷。

他还买了不少清人墨迹，扇面、条幅、楹联，有心收齐戊戌六君子的墨迹，已经有了若干件。他指着壁上邓石如行书“海为龙世界，天是鹤家乡”五言联告诉我，这副对联曾在毛

主席那里挂了一些日子。

在实行低工资年代，家英以有限的工资和稿费收购清儒墨迹，不遗余力，不仅装裱，还要外加布套布函。他乐呵呵地告诉我：“我儿子说爸爸的钱都买了大字报。董边(夫人)也说我布票都花了。”

家英在十几年中收集的藏品约五百家一千五百件。一九八九年北京出版的《书法丛刊》以专号介绍“小莽苍斋”藏品，可见一斑。家英说，所有这些将来都要归公，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早就盯上了，说都要收去。我想，家英早已有此打算。

一九六二年，我想办一个大型文摘刊物。家英看到我试编的《新华文萃》样本，要了一本。我说上面没有批准出版。他说：“我带回去放在主席桌上，他也许有兴趣翻翻。”这桩事，我一直提心吊胆，怕批评我绕过了中宣部，家英好像不在意。我想他是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的，否则他不会送给毛主席看。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版《新华文摘》，我的这一愿望才实现，而家英弃世已经十四年，我不能送这本刊物给他了。

我写这篇小文，除了怀念家英，同时想回答一个问题，广州《书刊报》“书写人生”征文启事说：“漫漫人生路，书可能是你的精神食粮，希望爱书的朋友写下最深刻的一点体会。”

我想了一下，我的体会是什么呢？能不能说，读书也是做人的权利：认识世界之权，调查研究之权，知己知彼之权，无圣人凡人之分。

家英说自己“十年京兆一书生，爱书爱字不爱名”。有人说家英书生气太重。在我看来，书生气比乡愿，比八面玲珑可贵。

我怀念书生家英，我的书友！
(本文节选自《相约在书店》，范用著)

【阅案所得】

王阳明、曾国藩家书：为人切忌『傲』



王阳明

家书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以家庭书信的形式，根据家中子弟的具体情况，进行语重心长的教育，一方面娓娓道来，亲切温和，一方面旁征博引，高屋建瓴，既有理论上的高度，又有亲情上的温度，往往比系统的教育理论更加见效。而在中国古代家书方面，王阳明、曾国藩可谓两座高峰，这两位经历相似，思想亦有交集，但具体而言，又有区别。

关于科举：不必过于看重

王阳明二十岁时第一次参加乡试，考取举人。二十二岁时考进士，未中，当时的学术大咖——内阁首辅李东阳对他说：“你这次没中状元，不过你写个状元赋试试看。”王阳明马上一挥而就，震惊当场。又过六年，公元1499年，王阳明考中进士，赐二甲进士第七。再看看曾国藩，一路考取秀才、举人，二十七岁考取进士，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，当时比王阳明还早一岁。

王同学和曾同学对科举的态度又如何呢？王同学很小的时候似乎就有先见之明，当他还是十多岁的小朋友时，就对老师说：“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”，“登第恐未为第

一等事，或读书学圣贤耳”，当年第一次会试不中，王爸爸鼓励他再接再厉，他却说：“你们以不登第为耻，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。”

王阳明的家书也表达了这种思想，他的《寄正宪男手墨》这样寄望于儿子，“科第之事，吾岂敢必于汝，得汝立志向上，则亦有足喜也。”当时是1527年，王阳明在率师出征的路上，儿子托付给亲戚，在信中，王阳明认为，读书考取举人进士，并非他对儿子的期望，只要儿子能够立志向上，他就觉得很高兴了。

同样，曾国藩对于弟弟和儿子的期待，也不在考试中进士上。在1842年，曾国藩尚为京官，在正月十八他写给弟弟的信中，认为弟弟们只要能够“发愤自立”，“虽不得科名，亦是男的大帮手”。老曾甚至举例说老家湘乡有哪些大贤大儒，并无功名，但照样怡然自乐，乡里闻名。既然不以功名念，那么老曾对于弟弟和子孙的期许是什么呢？在1856年(咸丰六年)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里这样说：“余不愿为大官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”，说得很清楚，就是成为“读书明理之君子”。

关于修养：为人切忌一个“傲”字



曾国藩

“谦受益，满招损”，这是中国人历来信奉的做人原则，说到底就是做人不能傲，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家书里都提到这一点，而且都把“傲”作为重点防范对象而来告诫子弟。

王阳明的《书正宪扇》有这么一段：“千罪百恶，皆从‘傲’上来。傲则自高自是，不肯屈下人。故为子而傲，必不能孝；为弟而傲，必不能悌。”当今人品德上的缺陷，主要就是“傲”，很多不良行为和罪恶都是因为傲慢产生的。因为傲慢，就会自以为是，不肯低下身姿。如果作为儿女傲慢，就不能尽孝；如果作为弟妹傲慢，就不能很好地和兄长姐姐相处。王阳明对于“傲”的危害，罗列得很详细，同时也认识得很深刻。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之后，王阳明又谆谆教诲：“汝曹为学，先要除此病根，方才有地可进。”你们想要学习进步，必须要除掉“傲”这个病根。

无独有偶，曾国藩对于“傲”也是极为警惕的，在道光二十四年写给弟弟的信中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吾人为学，最要虚心。”曾国藩见过一些颇有才华却不得志者，原因何在？就在于傲慢蒙蔽了他们的眼光，自己文章“实亦无过人之处”，但是却心高气傲，乡试的时候骂乡试题目一窍不通，会试的时候

骂会试题目一窍不通，骂了同学骂考官，一路骂下去，“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，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”，因为傲慢，不肯谦虚求学，最后把自己的前途也骂完了，“傲气既长，终不进功，所以潦倒一生，而无寸进也”。因此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写给弟弟的信中，总结了这么一句话：“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傲字致败”。这是传自他的祖父星冈公，他曾对曾国藩说：“尔若不傲，便好全了。”

关于立志：志之不立，劳苦无成

王阳明从小就重立志，他小时候听说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拉俘虏，就痛下决心立志，一定学好兵法，强国强兵，因此，他的志向就不在科举上。后来王阳明能率兵平定宁王的内乱，和他早年立志学兵法有很大的关系。因此，他在《示弟立志说》就提到：“夫学，莫先于立志。志之不立，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，劳苦无成矣。”学习一事，首要在于立志。如果没有立志，就如同种庄稼，没有先培植好植物的根，却徒然进行灌溉，再怎么辛苦，也无非是白白劳作一场。

曾国藩也把立志当成人生的根本和出发点，他认为人如果能立志，哪怕做圣贤豪杰也不是件困难的事情，有志之人何必去借助他人成事呢？在道光二十二年写给弟弟的信中，提到读书之道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立志，“盖世人读书，第一要有志”，“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”，有了志，读书就会求上进，不会自甘于落后，可见这立志，也与竞争心理有一定关系。只要立志，哪怕是在“旷野之地，热闹之场”，都能精心读书。

(据《广州日报》作者：刘黎平)